

作为“诗教”的战争书写

——论宗璞《西征记》中的诗与史

康宇辰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内迁大学学生从军是一段被湮没的爱国往事。宗璞的《野葫芦引》第三部《西征记》，在《南渡记》《东藏记》的叙事基础上，将虚构与史实杂糅，在诗与史的激荡和张力中凸显了战争年代青年积极从军的爱国主义崇高精神。在具体叙事中，宗璞用“英雄悲剧”和“成长历险”两个模式来叙写两位从军主人公澹台玮和孟灵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宗璞在编织历史故事之际对材料予以裁剪取舍，在小说中把头绪万千的多方角力尽量淡化，提纯出一切为了“民族大义”的“青年从军”精神；《西征记》突出“人情美”的审美趣味与宗璞受其熏陶教化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人格素养密切相关，小说在诗与史的叙事缝隙中，呈现出宗璞作品一以贯之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美学品格。

关键词 宗璞；《西征记》；西南联大；从军；诗教

—

诗与史的参差与互证，是一个古老的理论话题。如果以宗璞的《野葫芦引》为磨刀石，可以生发出诗史辩证的丰富理论空间。这一点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已有论者一再分析宗璞富有历史感的小说中虚实的张力^[1]，以及其写作所依托的个人经验的史学乃至民俗学价值^[2]。但这些研究比较侧重考察虚构文本的编织中历史作为素材的参与乃至两者间的缝隙，而较少涉及书写历史诗性的方法与意图。这方面，引入美国学者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思考，或许可以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怀特的元史学研究特别重视“转义”（tropic）^[3]的作用。“转义”有一种协调的功效，它使得话语在我们所陌生的经验领域和我们能够理解的经验之间进行协调，我们能理解一种经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足以驯化经验的话语秩序。具体到历史编纂学中，将世界叙述为可理解的“故事”的过程既离不开逻辑思维，却也更是一个诗性的过程，“转义”的修

辞和思维方式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书写和小说写作本质相同^[4]。对于包括历史叙事在内的一切叙事中“转义”的发现的发现，打破了文学与史学写作的界限。由此理解宗璞的创作，整个《野葫芦引》都可以看作诗性浓厚的历史书写。在宗璞描写的这段西南联大故事里，明伦大学是西南联大的替身，《野葫芦引》故事是真实历史的替身，一个野葫芦/小说家言，里面曲曲折折地装下了一个宇宙/一段现代中国历史。一切都是“转义”的修辞，宗璞由此把现代史变成了小说的形式，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写史。在《西征记》中，历史教授孟弗之在给女儿孟灵己的家书中感叹道：“我们读的历史，都是写的历史，和真实是有距离的，能测量出有多远就好了。你们在创造历史，能留下你们创造的真实，又要多少斗争。”^[5]孟弗之的话，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元史学”的思考，放在《野葫芦引》中，也和盘托出了这种意图写史的文学的难题。究竟历史的真实要如何把握呢？比起考证和编织汗牛充栋的西南联大史料，《野葫芦引》另辟了蹊径。不再是严格追求“回到历史现场”去拥抱史

实的可靠性，宗璞的小说依靠的是一种胸中郁勃之气，以西南联大老人的身心修养和历史阅历获得难能可贵的主体认知，以“诗”的方式写史，不拘泥于考据而得其风神。孟灵己式的创造历史的联大学生，其胸中次第恐怕只有少数属于此知识分子共同体的亲历者才能窥知。宗璞的衰年变法，正是靠这种历史亲历者的独特心智结构而得以成功。《野葫芦引》如果体贴到了一些历史幽深的隐秘，也正有赖于此。

作为诗化的历史，《野葫芦引》的写作方法像一切史著一样是转义的，但作为小说又是“虚构”的。它讲述历史的意图则可以概括为“诗教”。“诗教”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政治和教育的一个共同传统，起源于孔子对《诗经》的论说。《诗》是六艺之首，《礼记·经解》托言孔子道：“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西南联大文学教授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中有专章研究“诗教”，代表了联大学术共同体对于“诗教”的基本认识。“诗教”在其发生期主要不是文学概念，而是关乎讽谏政治和士人教养。朱自清讲解“温柔敦厚”时指出，诗教“‘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美刺讽谕不离乎政治，所谓‘《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就指美刺讽谕而言”^[6]。有研究者指出：“对于朱自清的审美理想，如果以明确的概念加以界说，这就是：温柔敦厚。”^[7]朱自清是如此，他的同事冯友兰作为后来被追认的新儒家也有类似气质。言志而兼美刺的文章，冯友兰相当拿手。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其女宗璞的《野葫芦引》中，父亲的化身是谐音为“孟夫子”的教授孟弗之。儒家人伦与人情的美感是《西征记》的底色，它的青年从军书写作作为“诗教”，一方面体现为诗意的笔法和动人的感兴，一方面把一种高尚醇厚的情操传染给读者。而如果对现代史的叙述可以温柔敦厚，收政治的劝百讽一之效，那又是贯通整个《野葫芦引》的苦心孤诣，不局限于一本《西征记》。

在讲述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从军而有“诗教”品格的《西征记》中，从军学生澹台玮和孟灵己是最耀眼的主角。宗璞“用人物统领材料”^[8]，围绕两位主角的生命进程，将诸多战时滇西抗战的故事编织起来。澹台玮是走向死，孟灵己是走向更新

的生。一致报国而命运迥异的两人，其抗战经历可以分别用“英雄悲剧”和“成长历险”两个情节模式来概括。英雄澹台玮的故事和结局，在纷繁复杂的《野葫芦引》中显得异常单纯。这种单纯表现在他的经历和性格上，这些成就了一个极度诗意提纯的书生从戎故事。《西征记》开头澹台玮的出场，始于他向老师萧子蔚通告自己投笔从军的决定。他的决心交待得非常朴素：那是他的“本分”。这决心干净利落地勾勒出一个高尚的青年心灵。然而，澹台玮故事和小说中其他人物不一样处，还在于预叙叙事写法的使用。在现代小说中“预叙”相对少见。所谓“预叙”即是预先写出以后发生的事，而澹台玮故事中第一个典型的预叙来自他和恋人殷大士的离别。当这对恋人登上反向行驶的两辆车，小说令人不安地写玮的心理：“他想再看一看大士，可是他没有看见她。他从此再也没有看见她。”^[9]初读之际我们会浮想联翩：是两人恋情有变，大士另有所爱吗？但看到小说第五章，我们就知道玮会战死。如果我们带着后见之明重读全书，会发现类似的暗示比比皆是。这种写法其实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叙事技巧的继承，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野葫芦引》借鉴了这样的写法，四部书开头设有序曲，对全书故事予以概括。第四支曲子“招魂云廬”是写“西征”之事的，其中写道：“五彩笔换了回日戈，壮也书生！把招魂两字写天庭。孤魂万里，怎破得瘴疠雾浓。摧心肝舍了青春景，明月芦花无影踪。莽天涯何处是归程？”^[10]这正是《西征记》中报国英雄命运的判词。而在小说开头，在中文系老师江昉的《楚辞》课上，作者更以《九歌·国殇》一诗奠定了《西征记》里诗意的英雄想象。江昉说人死精神不死，国家民族就靠这点精神^[11]。这是明仑大学进步教授对学生的爱国教育，接下来玮将会以生命代价实践这首诗和这种教诲。小说中还有多处预叙式的细节，如玮出发前到姐姐澹台玟处看望阿难，突然看着阿难想：“如果我死了，你会记得我么？”^[12]又对三姨妈吕碧初开玩笑说：“如果我负了伤，就去找媚。”^[13]这些话都一一成谶。

在西方古典悲剧理论中，悲剧往往是对灾难中的英雄/神祇之不幸的表现。澹台玮的悲剧，有种西方古典悲剧的韵味：他是一个英雄，他的故事悲

惨而荡气回肠。具体到小说中，宗璞先是安排了澹台玮和逃避兵役的学生蒋文长的对照，之后玮战斗负伤时，又安排了哈察明对他予以“逃兵”的污蔑。在高贵与卑陋之间，宗璞造成了一种情感的不平之势，也正是在小人和腐败社会的反衬下，玮才有了一种别样的崇高，而玮的悲壮“净化”了我们的灵魂，这也是“诗教”的题中之意。澹台玮之死是《西征记》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一首极度抒情、哀情的挽歌。玮负伤后昏睡的梦里，听到了恋人殷大士的“我等你”，听到了牺牲的小战士福留的“我等你”，生的愿望和死的休息，各自在将他拉扯，当一路走来的死之预感豁然贯通，他自知命运已在宣布他的必死。最终，战士念着“祈祷和平”溘然长往，但小说前文作为死的预告文本的《看那小草听那小草》说了更耐人寻味的话。这篇短文是福留在召唤玮，展现了高黎贡山战场上死后魂魄们的世界。福留死了，玮说：“福留，你做了很了不起的事。”“人们会记住你。”福留则说：“许多人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谁会一一记住他们？”^[14]于是在福留“我是高黎贡山的一棵草”的回应中，玮说出了“我是昆明的一棵草——北平的一棵草”^[15]。在这绝对的人与草的平等中，宗璞表达了某种“天地不仁”式的感喟。这让人想起西南联大参军诗人穆旦的献诗《森林之魅》的结尾：“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16]无论对玮，还是对穆旦笔下胡康河上的白骨，英雄的壮举最终都会湮灭于自然的循环，但万类生长却正有赖于英雄的骨血与精神的滋养。澹台玮式的热血青年为了国家献出青春生命，堪称表率。而《西征记》用最浓郁的诗意激发读者的爱国热忱，对那湮没的学生从军往事也是郑重的祭奠。

和澹台玮的故事不同，小说中另一个参军学生孟灵己活了下来，她的故事可称为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17]。在巴赫金的长文《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中，成长小说被分为5类，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类特征是“人和世界一同成长”^[18]。巴赫金的描述对于我们认识孟灵己的成长故事颇有启发，因为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少女成人故事，时代的动荡、国族的前途确实构成了孟灵己生活重要转变的契机。而她也在投身时代风暴的过

程中，经历了战火中的“成人礼”。和玮一样，孟灵己也不在被征调的大四学生之列，但是凭着爱国的“热情”和“本分”，她自愿从军，此举被昆明的报纸当做爱国轶事广为宣传。考诸史料，当年女子从军较为少见，故令人格外注意^[19]，也体现出学生爱国不分男女；但同时女子从军又易被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人们艳谈的是“木兰从军”这样的战地雅事，但却又都暗暗怀疑她们真能起什么作用。战地医院中严颖书的心理可能是大家共有：“照颖书的想法，嵎这样的人是属于‘锦上添花’一类，现在需要的是‘雪中送炭’。”^[20]而孟灵己的故事，就是一个“无用”的女学生在战争中找寻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成长为一个更成熟的新女性的故事。

孟灵己在战地医院的第一份工作是会计，遭遇诸多是非，颖书好心把她安排到资料室。在这里，她利用自己出色的文字能力整理资料，翻译文稿，将一切打理得有条不紊。通过和坟场看守老战的交往，孟灵己开始接触更广大战时中国的现实。小说由孟灵己和丁医生帮老战恢复记忆的书写，触及了滇缅公路艰难修路与之后无奈毁路的过程。接下来，在奔赴前线时孟灵己遭遇泥石流，被傣族姑娘阿露所救，由城市进而接触到了中国乡土的战时环境。在这里，阿露供给她食物并为她疗伤。接下来两人救回一位负伤的飞行员本杰明·潘恩，但后者又因医治无效死去。老战为国修路却惨遭妻儿俱亡的遭遇，阿露和本杰明·潘恩相爱，都热烈地希望活下去，却最终死别，表哥澹台玮一腔报国热情却负伤死去……在如此艰难境遇下，战地医院却仍然暗藏贪污腐败，凡此种种，让孟灵己进一步意识到了人世的复杂和战争的残酷。她在战时的艰难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变得更加成熟稳重。抗战胜利后学生运动在明仑大学风起云涌，然而“孟灵己远不如以前活跃，专心研究数学。她似乎对人生有了看法，认为激情是很表面的东西，愿意多作思考”^[21]。此时，孟灵己先于同龄人经过了战场生活，早熟的她已然意识到仅凭学生激情成不了事这一事实。

同是处身战时大后方云南的女青年，孟灵己和她母亲的远亲吕香阁十分不同。孟灵己看到了社会的阴暗，所以更加择善固执，这也是她的家庭和西

南联大/明仑大学师生的多数性格。历史让她成长，她吞咽下晦暗的阅历，选择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初衷。而吕香阁则信奉“人往高处走”，一再依附有用于己的男性，到昆明开了咖啡馆、跳舞场，到滇缅公路走私烟土玉器，并最终凭借美貌和孟家“亲戚”的招牌嫁给了瓷里土司，挣到了地位和财富。在小说中，吕香阁是一个反面参照，宗璞真正认同的还是知识女性善良明慧的性情操守。孟灵己这样雅正而懂事的女性知识分子，是抗战时代知识女青年的另一种成人可能。时代并不因胜利而减少了险恶，要应对它需要更有韧性和弹性的心智。孟灵己活了下来，她并不一定达到成长小说里“新人”的完成度，只是比起被唤醒而激进的林道静们，她的成长保有一种接续中国传统伦理和审美的正面意义，她不是“革命的”，宗璞的书写或许正是在“革命新人”以外为知识女性寻找一种人格态度。时代教会了孟灵己这类知识女性辩证法，包括革命的辩证法，而死亡也教会她们明白了人的限度，知道事有两端，人有极限，不卑不亢地静候前途。然而，孟灵己的成人，是一种美好而缺乏历史远景的人格，带着后见之明的我们知道她有受难的一生——她并不是时代的成功者，这种固执的择善和受难的命运，使宗璞的诗教也充满无解的困惑，那教人向善的文学，为何最终无法给出人生安顿的答案呢？

二

除了主人公们的历险和成长，《野葫芦引》更是一个大学故事，书中的大学师生群像亦值得关注。托名“明仑大学”的战时后方最高学府，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尤其是其中清华大学的影射。冯家在抗战时期主要生活、学习、工作于西南联大，冯友兰是联大哲学教授和文学院院长，长子冯钟辽是联大学生，后来确有作为学生参军任译员的经历^[22]，宗璞是联大附中学生。由此可知，宗璞写联大故事，有亲身经验和诸多人证提供素材。明仑大学的师生，很多人都有真实历史人物的风神。托名虚构，不重史料考据而得其风神，是小说家更擅长的方式，也在历史的不便言说之处有伸缩曲折的自由。作为小说，《野葫芦引》的写史抱负确实被学者赞赏，陈

平原立言道：“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像’，汪曾祺的散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23]以诗的方式写史，对读者进行“诗教”，正是《野葫芦引》的特点。

《西征记》中写明仑大学的征兵与民主运动，给了我们观察宗璞的大学故事中诗史辩证的好案例。小说开始于1944年昆明的冬雪中，这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7年，云南的中国军队也进入了远征缅甸的反攻阶段。此时美军来华作战，急需翻译和能使用先进武器的高素质人才，这使得战争初期为保护“建国”精英力量而免于征召的学生阶层也被纳入兵源范围。接受蒋介石《告知识青年从军书》的训令，后方各大学开始了征兵，这是小说中明仑大学从军动员活动的背景。

“This is your war!”明仑大学的壁报上这样写道，这也就是玮和崧所相信的“本分”的由来，因为滇西被日军侵袭，昆明由后方一跃而为前线。时在成都的前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恐昆明将陷敌，而联大或解散也。”^[24]可见情况危急，当兵参战成了每个人分内的事。宗璞为此在小说中叙写了从军的澹台玮、冷若安和逃避兵役的蒋文长、栾必飞的态度分歧。蒋文长不想参军，对人称自己英文糟糕，去了不起作用；而栾必飞更加聪明，不停地在二三年级转系，这样就永远到不了四年级，而不到四年级就不用毕业，就可以不担当服役的责任。蒋、栾二人自私自利，却又自我标榜为清高。对此，玮的评价是：“‘清高’是个好词，可是他要有个界限。若是取消了社会责任感，就是自私的代名词。”^[25]拒绝参军为什么就是“清高”？这其实源于真实历史上学生与当时的执政党、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关联，当初的西南联大，是一个政治性浓厚，师生立场错综复杂的高校，投射到小说中，明仑大学也仍有此特征，我们不妨考察一下。

宗璞笔下的明仑大学学生晏不来是一个进步分子，他在与孟弗之的对话中提及进步教授江昉对学生从军的支持态度：“江先生鼓励学生从军，受到有些进步学生的批评，说这是帮助腐败的政府。江先生对这样的批评不以为然。可是，据说这种批评是有来头的。”^[26]原来江昉对学生的劝说是：“政

府虽然腐败，国难是大家的。”^[27]这个历史细节不可谓不真实。这次学生征兵发生在1944年冬，明仑大学的原型西南联大这时民主运动呼声日高，学生中也确有共产党在活动。这是一个让国民政府头疼的问题，1944年底一次联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梅贻琦就有这样的报告记录在案：“教育部为闻校内发现奸党传单、标语，并有局部集会，望随时电告详情并加意防范密电令。”^[28]从两年后胜利时的纪念刊《联大八年》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即将复员的西南联大学生鲜明的政治性，此书从政治立场、与政府关系、对学生运动的态度等方面对联大教授大加臧否。可见面对从军令，学生并不是一张政治的白纸，从军与否也不尽然是出于民族大义的衡量。拒绝从军，可能是拒绝与国民党系统勾连，这正是说“清高”的真正原因。

历史上的西南联大，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起，很多学生就对国民党充满抵触。这也是为什么西南联大要向国民政府争取参军学生为“国防军”，也即争取是国家而非党派的军队^[29]。而关于国民党吸收学生参军的政治用心，联大从军学生蒋大宗就提到，国民党军队曾自动扣除军饷的一小部分，名目是“党费”，相当于把学生军自动归为党员，此举曾遭到抵制^[30]。可见进入军队的学生们不管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免搅进政治的浑水。这样看来，澹台玮从“社会责任感”出发不赞同“清高”，既是高觉悟，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天真。

为了鼓励学生从军，明仑大学当局采取了强硬的制度性推动，明确规定：大四男生如不服从征调，将不予毕业^[31]。对学校这种态度，学生们各有感想：“有的人说，能有机会直接为抗战出点儿力，以后胜利了也心安；有人说，正不想念书呢，到丛林里打仗多浪漫；可也有人不想去。也有闲话，说校长和先生们是向上面邀功。”^[32]虽有如此议论，小说中许多师生在从军问题上却是言行一致。教授家庭中，就有孟灵己、李之薇这样的女孩要求从军。总的来说，《西征记》虽也涉及大学政治，但主要是对历史的诗化和提纯，而这提纯又主要是晓以民族大义。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蠢蠢欲动的内部力量和利益纷争都被暂时掩盖，小说主要以高亢的爱

国壮剧模式讲述了战争，这是对读者的“诗教”陶冶，但也是对历史事实的选择性编织。对此小说家言，我们固然不应苛求，但是与“民族大义”的论述逻辑相比，历史有什么更繁复的理路？这可能是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历史、也理解《西征记》用意的探问。

目前学界对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研究^[33]一般认为联大有3次（闻黎明认为有4次）从军热潮，这一从军热潮得到多数教员的支持。时任教育学系主任陈雪屏是国民党联大区党部负责人，早在1942年底就有文章《论学生服兵役》^[34]主张学生从军。此文比1944年初蒋介石训勉从军学生和年底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要早。梅贻琦校长也早在1943年就做过动员工作。据学生回忆，梅贻琦公布完从军优待方案后直白地说：“我希望同学参加。但我不得不对同学们说，这工作是艰苦的，而且是有危险的。如果同学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不怕危险，那么到教务处去报名。我认为你是联大的好学生。”^[35]这是校方的最高表态，可看出是近人情而不虚夸的，在战时动员中很难得。1943年秋，冯钟辽报名参军，冯友兰参加了动员演讲，据载：“讲演后先生在门外见有大字报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慎重考虑，先生将大字报撕去，说‘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36]

但这是1943年的情境，到了1944年底，情况又有不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越来越不得人心，学生不愿因参军而被政治绑架。据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日记1944年11月22日、24日载，从军征集令公布之初应者寥寥，联大校方还开校务会议商议扩大军训^[37]。到29日联大举行教师演讲鼓动从军：“首月涵，次端升、芝生、枚荪、一多、召亭，立论虽不同，而主张从军则一。”这之后才有了“登记从军者纷纷不绝”，超出政府预期人数的结果^[38]。动员演讲中闻一多鼓吹参军是民主力量的把“兵权”拿过来，壮大民主势力^[39]。这个主张在学生进入国民党军队系统后迅速幻灭，腐败的军队并不是几滴无权势的新鲜血液可以挽救的^[40]。更多的师生没有闻一多那种诗人的天真，用各种曲曲折折的方法表达着他们的思考和谏言。如潘光旦在一次演说中不仅动员学生，更含蓄地向政府进言。

他一方面主张抗战“建国”相互关联不可割裂，准备着“建国”的青年应为“抗战”出力，一面又说：

近代军事的成败利钝，有赖于前方将士用命与配备充足者可能只是一小半，而有赖于大后方的生活条理的整饬者可能的是一大半。……换言之，我们一面要建立新军，同时我们必须建立一番新的经济与新的政治来和它配合，建立前者既然是知识青年的职责，建立后者必然的是我们壮年人以至于老年人的任务了。^[41]

和潘光旦看法相同的联大教师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从军同学返校诉说国民党军队腐败以后。郑天挺日记载：“（从军学生回校后欢迎会上——引者注）发言者甚多，皆表示不满，所举军队走私侵蚀及军人嫖赌诸事实令人发指，而驳众之无理无法无计划。”^[42]而一些教授之前积极支持子女从军，但得知真相后很感痛心，《联大八年》载：“前次知识青年从军，刘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营。可是后来在欢迎从军同学返昆席上，刘先生致词，当他说到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去。”^[43]西南联大师生在“参军”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从军让书生们发现了国家社会更大的黑暗，从此民主运动沛然莫之能御。《联大八年》如是描述这一过程：

在这个时期中尤其重大的是青年从军和译员征调，使许多从未离开学府官墙的同学，钻进了中国现社会最阴暗的一面，让大家深深感到对于国民切身的利害，不能漠视，于是激昂的喊出民主的口号，国是宣言，五四游行，双十节纪念，都是这个口号下瞩目的表现，到今天，“民主堡垒”的名号，不但能够保持，而且有所光大。^[44]

正是应和着这样的联大往事，《西征记》没有以中国战胜日本收尾，而是写出了长长的第七章。在这一章中，抗战胜利后的从军学生们回到课堂，但并没有一味沉浸于胜利之中，而是思考着接下来的政局走向，在进步学生组织下以学潮的方式反对内战。至于教授们更是纷纷为内战的迫近感到忧虑，他们或倾向国共中的某一方，或希望走中间道路，政治态度明显有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征记》浓

墨重彩地写了严亮祖将军的“死谏”。同样作为军人，玮的死是一首荡气回肠的诗，而严亮祖的自我牺牲却并不能挽回历史的走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死谏”其实并无效果。应该说，宗璞对严亮祖之死的虚构，在内战的残酷现实中，建构了一种壮烈哀伤的“诗教”，超越了党派利益的“献生”代价无可计量，但却在我们讲述历史时给了事件一种血肉的痛感与高贵。不知是否是虚构的严亮祖的死，换回了闻一多化身的江昉的生。在历史真实中，闻一多作为进步教授和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而江昉则在暗杀来临时由植物学家周弼替他挡下子弹，最后周弼惨死，江昉幸存。这诗与史的对照，显出了宗璞对闻一多之死的惋惜，历史中的死者在小说中被救了下来，作为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携家人去了延安。这个讲述老大学的“诗教”故事，的确有一种面对历史的温柔敦厚之情。

三

书写西南联大故事的小说，常常都在刻画一种符合知识分子趣味的人情之美，鹿桥书写“青春神话”的《未央歌》是如此，《野葫芦引》也是如此。当初战时后方高校文化也有类似的审美追求。冯友兰于战火中的1943年就写下了《论风流》这样一篇关于魏晋风度的妙文。可能因为战时大学内迁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是接续古代传统的又一场“南渡”，所以一时怀古思今的诗文遍地开花，陈寅恪的感叹“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成为一个公共的感受。而对于冯氏父女的写作心态，已有研究者指出：“按冯友兰对于南渡历史的论断，古之南渡‘未有能北返者’，而吾人之第四次南渡成功北返，改变了历史的宿命，也改变了南渡文学叙事的悲情传统。这样昂扬的情绪与历史意识也成为其女宗璞《野葫芦引》写作的伦理意识和美学原则。”^[45]南渡及由此勾连出的魏晋风度，作为应对国事衰微的人格方式，也包含对北归的后涉认知，在后人的西南联大追念中成为热点话题。南渡深刻影响了当时学院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北归又给了后人讲述历史的昂扬情绪。宗璞的青年从军书写就扎根于此。

西南联大地处“云南王”龙云治下的昆明，不在中央驻扎的陪都重庆，相对重庆高校，它“山高皇帝远”，比较“自由”。联大有一门全校公共课“大一国文”，由中文系教授杨振声带领一个班子编纂教材和设计课程。他们的大一国文教科书，把民族文化经典作为一种爱国教育传授给联大所有一年级新生，其中有许多篇目特别强调渊雅俊逸的传统人格之美。诸如《论语》《世说新语》经典段落的入选，都有人格养成的潜移默化作用，这不只是语文教育，更是美育。可以想见，饱受熏染的联大学生，书写校园故事必然不同凡响。

在这样的视野里，我们或许较能理解《西征记》中突出的人情美的描写。宗璞写这些泛着神光的英雄儿女们，处处是自己的胸怀寄托和对西南联大精神的追抚。冯友兰《论风流》里有一个说法：真风流者当有“深情”和“玄心”，所以真风流者“有情而无我”，即是说他们的哀乐不在于一己的祸福得失，而是从天或道的观点化解了无常之哀，达到“忘情”。宗璞的战争故事或许还不能达到这样的“忘情”，但其中的清和流美，确实可称“有情而无我”，有战时后方文人所理解的魏晋风度。小说开头写大学教职工的贫穷，以及在这样的处境下教育部要给学校管理者发特殊津贴，而孟弗之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为由拒绝了，并参与到教授们卖字卖印章的行列中。云南战事进行中，教育界更是组织义卖，捐飞机、捐棉衣支援前方。这种种都是西南联大历史上的真事，宗璞有意铺排，表达了她对教育界人情美的认同。这些知识分子在她笔下并不局限于个人悲欢，而是有更大的爱与关切。以此心境而观战时百态，哪怕对民间小人物的命运也十分同情，小说结尾宗璞写女仆青环来请教碧初自己的婚姻大事，两个追求者柴发利和苦留都是忠厚之人，而碧初告之以“身安”与“心安”的差别，青环如有所悟，最终放弃财富选择了真正爱慕的苦留，这主仆二人的问答与抉择，都可谓不俗。宗璞的诗意安排，关切到了学院内外的世界，具有深厚的同情心，故事人物多数行为也深合中国古典伦理的“仁”和“义”。这些战火中善良的可贵，正如严颖书评选先进医护人员时的感慨：“几句表扬算什么”，“哪里能见得出这些人的心”^[46]。

真实的历史则体现了更为复杂的面相，在此，不妨看看历史上的从军学生、记者们一线的观察。有一个随军记者名吕德润，复旦大学毕业，1944年任重庆大公报记者，26岁赴缅甸战地采访。他虽不是联大学生军，但和他们学养、年龄、立场相似。1945年初中印公路通车典礼时，吕德润在现场问中国民工：“你们对抗战出了力，当官的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而民工们的反应是：“他们一时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像很惊异。我目不转睛地看他们，他们都摇头了。”而更让吕德润痛心的是：“几个美国兵从车上丢下许多东西，他们欢天喜地争抢。这几个大人像小孩子争糖果似的夺起来。”而随后通车典礼的娱乐节目中，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被强迫表演杂技更是破坏了许多中外来宾的心情^[47]。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记者的观察，丰富而鲜活地呈现出了战时中国民众愚昧的一面。

宗璞也不能回避战时中国的腐败问题，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具体体现在小说中战地医院的书写上。院长陈大富和其心腹小陈贪污医用物资，造成了许多战士药物不足死去。经过颖书和洪上尉的努力，最终贪污者被绳之以法。而陈大富一家人收养孤儿过多确实入不敷出的拮据也让人同情，体现出复杂的战时百态。但宗璞这样的写法，或许还是用“人情美”改写生活的结果，她不忍心照搬更为晦暗的现实。在从军学生回忆录中，不止一个学生军提到战时物资供应部门的腐败。比如这则回忆：

传闻都说，战地服务团是个贪污集团。它所使用的大量永久性的生活用品，如床、被褥、蚊帐等都由区部采购，发往各招待所；而食品都由招待所采购，可从中做手脚、拿回扣。李维时和我对于贪污一窍不通，认真对待一切物品的收发。李还派我协助总务人员监督食堂的采购。我们这种认真的态度堵塞了贪污的漏洞，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忌恨，影响到我们工作的调动。^[48]

可见在现实中，可能不是贪污者被处罚，而是天真正义的学生因揭发贪污而遭嫉恨、被调动。贪污是中国在战时普遍的弊病，正直的翻译官维护祖国尊严、纠正歪风邪气的努力几乎是没有效果的，还会

引起美军的不满、中国贪污者的嫉恨。且因中美实力悬殊，种族歧视确实严重存在，美军欺辱中国士兵，到了中国乡镇骚扰中国百姓的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学生军们也分外渴望奋斗自强，为中国争一口气。在这样的战争和国族实际面前，宗璞却大胆地写下阿露和本杰明·潘恩的纯洁爱情故事，写美国军人对着劳苦民夫们用中文高喊“光荣”以表敬意，这也是极度理想化的人情美的展现，固然不是绝不可能，但其中提纯了多少杂芜的现实也可想而知。只是宗璞作为历史亲历者，或许并非纯出于迂阔天真，而是执拗地追求着她心中的西南联大精神和对人情的审美判断。

甚至《西征记》的高潮情节——澹台玮的牺牲，也是一种和从军学生实况颇有出入的美化。曾任西南联大学生翻译官的许渊冲在回忆录《联大人九歌》中曾谈到学生参军，他给学生的态度分出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几种^[49]，这其实是冯友兰当年的人生境界哲学的谐用，但许渊冲自我坦白他是在自然、功利、道德境界中徘徊，说明了联大学生军思想的复杂性。1944年郑天挺日记中也曾载：“有学生二人来，谓学校使学生参加通译工作为不当，以其无理更无礼，深责之。”^[50]参军翻译官牺牲很少，而1944—1945年间的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中，却有多位学生因逃避兵役而被开除学籍^[51]。联大1944年底扩大军训后，甚至受到重庆政府的猜忌，“以为将生大问题，嘱陈月涵先生慎重将事”^[52]。可见玮的形象是一种高度诗意的提纯，而历史中的翻译官们就算恪尽职守，也和国民党、美军有矛盾，前线危险，复员后出路艰难，这些“杂质”都是诗一般的澹台玮回避了的——他英雄早夭，未经历人生更多的险恶。宗璞仅仅是把联大学生军最英勇明亮的部分写成了一首性格与命运的诗。

宗璞对人情美的祈盼，甚至延及她书写敌军日本人。《西征记》塑造了一个日本逃兵吉野，他反感战争，私自脱离队伍，最终被中国军队发现，成为战俘。他对中美军人的自白是：

“我从头就怀疑这次战争的意义，无论加上多少好的词汇，都不能掩饰我们是侵略者。

占据了别人的土地，要在别人的家里死守，没有援助，只有死守，守的不是自己的家——”

吉野的话忽然中断了，他没有说出“所以我逃跑”。^[53]

考诸史料，不能说吉野这样的日本兵就不存在，只是数量肯定不会多。抓住吉野的冷若安和布林顿对他的看法是：“仇恨是可以化解的，但那必须是在正义伸张之后。”^[54]这种大道理固然符合冯友兰认为的“美人格”中必须含有的超越性，只是这个视角或许不能起到任何接地气的效用。抗战中的学生译员们，对日军自然另有看法。在从军学生回忆中，除了日本兵滥杀平民、掠夺中国资源财富的诸多恶行以外，也有对日军勇敢的提及。只是战争双方必定你死我活，只有在宗璞的大学故事里，敌人才能超越国族利害得到一丝对手国家的同情，虽然这同情之后当然还是中国本位的叙事立场。而在对史实的了解和诗意加工后，宗璞讲述了一个以人性之善为主旨的青年从军故事，它今天仍然可以引起有识者的共感，并将那遥远年代里的西南联大精神传承下去。

《西征记》中一切对于善的诗意书写，都是一种战争“诗教”。澹台玮的部分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宗璞从一个战争中的翻译官死亡中，体悟出了为国牺牲的崇高意义。孟灵己的成长则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人生态度、政治态度长成的故事。她的经历把她教养成了一个更懂得生死之重，更警惕盲目的政治热情的人，这种经验能注入人物，或许在本事层面靠的不仅是宗璞在西南联大附中的经历和思考，而更是后来在当代史中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苦涩阅历。至于明仑大学故事与西南联大本事的对照，则更见出小说“诗教”的立意所在：滤净了国民党以招兵控制青年的用心，滤净了美国军人的种族歧视，滤净了学生对从军优待的衡估，滤净了翻译官普遍的战后生计问题，这个大学生从军故事反复回到“民族大义”，是提纯了的诗。而对人情之美的强调，建立的是一个大学故事中善的乌托邦，《西征记》中好人尚应接不暇，就算是有吕香阁、哈察明这样的人物，也并不足以用人性阴暗面推翻小说主基调。或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西南联大的当下意义：它是一个历史中的乐园，正因为历史永

远过去,它才作为失去的乐园越发耀眼,它的意义在于给后世树立了一种人格理想,提供了一种审美诗教。

[1] 参见徐岱:《史与诗的张力:论宗璞和她的〈野葫芦引〉》,《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2] 参见潘向黎:《〈野葫芦引〉如何还原历史?》,《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

[3] 据海登·怀特的理论,“转义”包括隐喻、换喻、提喻、反讽,这些也是诗歌写作的方法。

[4] 以上理论主要概括和转述自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著《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20] [21] [22] [25] [26] [27] [31] [32] [46]

[53] [54] 宗璞:《西征记》,第62—63页,第327页,第40页,书前扉页,第12—13页,第10页,第35页,第128页,第129页,第53页,第278页,第328页,第33—34页,第25页,第4页,第5页,第4页,第176—177页,第252页,第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6] 朱自清:《诗言志辨·诗教》,引自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253—25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 吴周文:《诗教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互融——论朱自清散文的美学风格》,《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6] 穆旦:《穆旦诗文集》(增订本)第1册,第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7] 成长小说和教育小说是同一个德语词Bildungsroman的两种不同译法。

[18]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第232—23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 女学生从军者较少,但也屡有事例,如1938年《良友》画报第134期刊登组图《气壮河山:广西桂林国女学生出发抗敌》,呈现了抗战初期女学生从军事迹。

[23] 陈平原:《宗璞“过去式”》,《文汇报》2011年8月9日。

[24]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9册,第371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28] [51]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357页,第336页、第338页、第359等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9] [36] 参见蔡仲德编撰:《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393页,第379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30] 参见蒋大宗:《打出丛林区,进军密支那》,西南联大1944级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内部刊行),第43页,2003年版。

[33] 如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青年远征军》两篇论文,陈向林的硕士论文《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运动研究》。

[34] 参见陈雪屏:《论学生服兵役》,刊于《当代评论》1942年第3卷第4期。

[35] 程耀德:《一篇日记——梅校长动员我们当通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内部刊行),第26页。

[37] [38] [42] [50] [52]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俞国林点校,第959页,第962页,第1070页,第787页,第968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39] 参见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40] [43] [44] 参见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第124—151页,第206页,第55页,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41] 潘光旦:《论知识青年从军》,《自由之路》,第197—198页,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

[45] 陈庆妃:《“南渡”文学叙事的三种范式——由〈野葫芦引〉〈巨流河〉〈桑青与桃红〉谈起》,《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47] 吕德润:《首批随车队到昆明》,《大公报》1945年2月12日。

[48] 杨先键:《两年翻译生涯 履行国民外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内部刊行),第22页。

[49] 参见许渊冲:《联大人九歌》,第2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费冬梅